

向阳湖归来

——以张光年晚年思想转变为支点的史料考察

韩 晗

摘要：本文以张光年晚年思想的转变为支点，从史料的角度分析了张光年在“向阳湖”劳改期间心态、情感的变化以及这些何以成为其晚年思想转变的动因。在分析的过程中认为，正是“向阳湖”的劳改经历，使得张光年有了切实重新认识人生、升华自我的动力，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思想转变的主要动因。张光年作为一个研究个案，反映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之于其他同时代作家晚年的思想转变，亦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张光年；向阳湖；干校；文革；思想转变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7-0134-05

1969年12月，作家张光年来到了咸宁向阳湖干校“劳动改造”，劳改时间长达五年半，用张光年自己的话说，是“十年文革，七年干校”^①。向阳湖归来的张光年，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一度曾用“十年噩梦醒来迟”^②来形容自己思想的转变，否定自己过去的想法与言论。在整个意识形态纷乱的八九十年代，张光年曾力排众议发表《新来的班主任》、在“《苦恋》事件”中与林默涵争论，甚至被批判犯了“自由化”错误，这些事件组成了一个真正有立场与正义感的文学批评家张光年的形象，这也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他再一次闪亮出场。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备举足轻重意义的人物，“向阳湖归来”的张光年，应该引起学界重视。本文以晚年（1975年6月21日结束“劳改”之后）张光年思想的转变为支点，结合其在劳改前后发表的论著进行史料性的谱系考察，进而试图审理、总结其思想转变的动因、影响及根源。

一

与当时大多数作家不同，张光年1969年底被获准去向阳湖改造，乃是自己“多次申请”的结果。据张光年自己回忆，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作家协会首当其冲被军宣队砸烂，作家受到批斗，张光年自然无法幸免。面对军宣队的横暴，以及“中

央专案组”的非法监控，张光年备受侮辱，“身受者不堪回忆”、“多次申请”去向阳湖劳改^③。当时的张光年，认为劳改也比呆在北京好得多，这便是张光年偕同夫人黄叶绿一同到向阳湖劳改的缘由。

劳改五年半，张光年每天坚持记日记，这构成了其劳改生活最直接的“自我叙事”，这些日记在2004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结集为《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出版。回到北京后的张光年，仍然坚持记日记，1977年至1980年的四年日记以《文学活动日记》为题，分别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第4期与1999年第1期、第2期全文刊登，1981年的日记则节选为《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刊发于《百年潮》1998年第1期。

这些日记见证了张光年晚年思想立场及其转变过程，当然，与这些日记存在着共时性关系的，还有张光年晚年所撰写的书信、序跋、论稿与大会发言。自1980年至其病逝前，张光年可谓著述繁多，笔耕不辍。

80年代初，当保守派对《苦恋》进行批判时，张光年曾努力对于“极左”予以避免与纠正，他认为“（刘）白羽、（林）默涵咄咄逼人”、“报刊批评上纲过高”，甚至他“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并认为黄钢的批判长文“上纲过高，增刊在大街上叫卖，引起群众和文化界惊异”，而且，黄秋耘委托韦君宜前来向张光年说情，“怕发展为反右运

动，十分忧虑”。张光年则称：“六中全会后，大局是好的，不会有大的反复”，“我是人微言轻，但一定要尽到一个党员作家的责任，请他（黄秋耘）放心”^④。当“保守派”要求他对批《苦恋》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修改时，他断然予以拒绝，并在日记中记录：“他们想改成一篇上纲较高的社论性文字，这和小平同志原意相违反，是不能同意的。”^⑤在此之后，在批现代派、批周扬时，张光年曾旗帜鲜明地与周扬一道站在“改革派”的阵营里，进而引发了中宣部某些保守派官员的不满。李洁非认为：“张光年个人与中宣部有关领导的关系，就是从批现代派、批周扬这两件事开始恶化的。”^⑥因为张光年的这些言论、举动，在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时，中顾委曾专门就张光年的问题召开“批评帮助的生活会”^⑦。但是张光年却获得了改革派知识分子们的拥戴，在1984年第四届文代会的理事会选举中，巴金得票第一，张光年与刘宾雁以相同票数并列第二，王蒙得票第三。

晚年张光年最交好的朋友，一是巴金，一为王蒙（张光年与刘宾雁的交往，目前暂无史料可查），同时，他在日记中对于贺敬之、刘白羽与林默涵等保守派作家却颇有微词，观其友知其人，凭此可知张光年之思想立场，已然倒向了改革派的一边。

巴金与张光年在八九十年代有过非常亲密的交往，这已为文学史研究界所公认，且巴金的《随感录》与《讲真话的书》出版之后，张光年还曾致信：“都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好书，是您晚年多病中最宝贵的贡献”，可以教导青年“防止‘文革’式的悲剧重演”^⑧，并用了“情透纸背、力透纸背、热透纸背”来形容五本《随感录》的出版，遂一时传为名言。

王蒙与张光年晚年之交往则更意味。在海外一些刊物中，会提及王蒙与张光年曾一度交恶，乃是由于张光年在80年代后期曾与其他作家一道批判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据笔者考证，此说并不属实。事实上，王蒙与张光年有着自始至终不错的私交。对于海外媒体对张、王之间关系的臆测甚至捕风捉影，王蒙亦撰文批驳：“香港出版过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它写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道是生编硬造的了。”^⑨

1986年张光年曾给曾镇南的《王蒙论》写序，大为推崇王蒙的作品，称王蒙为“当代文学的奇才”，其作品“给人以心灵上的撞击”^⑩；同年，王蒙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之前，他曾委托张光年给乔石带话，意图请辞，此足以见得王蒙对张光年之信

任；2000年张光年病逝，王蒙撰写《光年千古》一文，给了张光年这位老领导、老朋友富于真情、高度正面的赞誉：

《黄河大合唱》歌词的这位作者，生时如黄河奔流，波涛汹涌，九曲连环；死时如雪山崩颓，烟飘云散，一了百了。好一个诗人光未然，好一个革命者、评论家、老领导、老师长和老朋友张光年同志，你活得充实，走得利落……他是一个尖兵，多年来战斗在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文艺斗争与改革开放的最前线，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⑪

二

前文所述之张光年，乃是“向阳湖归来”之张光年，这并非一个完整的张光年。纵观其一生，简略言之，可称之为“三个张光年”，前文所述乃是第三个张光年。第一个张光年是一位风华正茂的文学青年，不足而立之年便以光未然之笔名创作出了《五月的鲜花》与《黄河大合唱》；第二个张光年是1949年之后直至1966年的张光年，此段时期，张光年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制定、执行一系列“左倾”甚至“极左”的文艺政策，对“十七年”中国文学甚至当代中国文坛产生了负面影响，用张景超的话说就是“他的名字一直同反右斗争、反修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⑫。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段时期的张光年，并非如柯灵、欧阳山甚至巴金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历经反右、反修的他，早已从一般刊物《剧本》杂志主编升任为官方文艺喉舌《文艺报》的主编，从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务长攀升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者之一，成为了主导当时中国文学方向的几位少数文坛“实权派”。

笔者在此借用斯图亚特·霍尔“个人性/公共性”理论，将张光年在“十七年”中的两类行为予以区别。一是“个人性的行为”，即对“三何”（李何林、何其芳与何直）和苏联电影艺术家丘赫莱依的粗暴批判；二是“公共性的行为”，即张光年执掌《文艺报》时，办刊方针堪称雪中送冰、火上浇油，极力推行“极左”政策，使该刊陷入“越办越左、越左越办”的恶性循环，甚至还将《文艺报》的人事任用作为整人工具。

反右之前，张光年写文章尚属低调，只公开发表了《从〈文艺报〉的错误吸取教训，切实检查并改进我们的编辑工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

奋斗的中国话剧》两篇应景约稿。待到1958年，张光年顿时如赛车手一般迅速插进了极左的快车道，1958年发表的两文一改先前谨慎应景之风，《向作曲家们建议——为大跃进的歌谣作曲》令人振聋发聩，《好一个“改进计划”！》堪称掷地有声。

从此，张光年从诗人变成了喉舌，从幕后踱到了台前，并善用不同的武器，专找对手软肋。譬如1960年批判李何林时，张光年用“公式法”在《文艺报》上对李何林上纲上线：“按照李何林同志的公式，势必取消了毛主席所说的‘文艺问题两条战线的斗争’”，“按照李何林同志的公式，就有贬低无产阶级文艺新生事物的危险”，最后干脆一步送佛到西天——他（李何林）实际上修正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⑬。李何林断然未曾想到，张光年竟会下此狠手，使自己文革时险些惨死狱中。

如果说张光年对李何林下的是“狠手”的话，那么他对何直下的就是“快手”。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用通俗的笔法、简单的方式叙述了一个普遍真理——文学创作不能依据政治意识形态来左右，必须依靠作家本身的生活经验来决定。

正如王培元用“海内文章惊何直”^⑭来形容何直这篇文章的反响一样，张光年对何直的论稿几乎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其下手之快、立意之锐，甚至不惜偷换概念，在客观上使得何直这篇文章名满天下。在批判何直时，张光年索性用“马克思主义”、“新的世界观”来替代“艺术”，称何直“不能划清新旧现实主义之区别”^⑮，何直因此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看来，张光年之论诚为上纲上线之谬论。

张光年批判丘赫莱依的电影《四十一个》简单地抓住了社会本质的教条，把社会科学的公式硬套在文学作品的评论上”^⑯，进而对丘赫莱依的电影作品刻意扭曲，认为丘赫莱依在作品中描述的反战情绪与人性光辉是“修正主义”，必须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当然，除了采取这些“文攻”的策略之外，张光年还采取了“武卫”的方式排斥异己，使得同僚闻名心惊、朋辈因此胆寒。张光年为人，工于心计”，“他的对立面，说他‘很厉害’，‘极善于见风使舵，借助风力，收到效果’”，“不属于一眼可以看透的人”^⑰。

如果说何直、李何林以及远在苏联的丘赫莱依因为与张光年没有太熟的交情而被其攻击是“情有

可原”的话，那么张光年对于自己的邻居、好友萧乾的欺骗与迫害就显得实在太“阴损”了。1956年意识形态斗争尖锐，《文艺报》亦不例外，作为主编的张光年苦于难以找到“替罪羊”。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邻居、民主党派作家萧乾。于是，他“礼聘”萧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萧乾说，起初“婉言谢绝呀，苦苦哀求呀，怎么也不中用。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上任以后的1957年，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萧乾才晓得，这是在张光年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萧乾“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萧乾）的大会上，他（张光年）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⑱

三

威尔曼认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权力者，多半是复杂、多变且善变的，他们会在不同的场域下，为了权力场的平衡而不断改变自己。”^⑲这句话用来诠释张光年的一生，显然是有着可借鉴之处的。

前文所述两个截然不同的张光年，实在令人觉得匪夷所思。与周扬不同，周扬30年代便是“左翼文坛”之“党代表”，长期身居高位，权力要比张光年大许多，因此其转型也可以看作是“历史代言人”的变化；与张天翼、臧克家等有过切身苦难经验的作家也不同，“向阳湖”前后，张光年在中国文坛都曾有着相当的实权职务，简而言之，自打张光年出道以来，除却“向阳湖”五年半，他一生都在做官。因此，“向阳湖”之于张光年晚年思想的转变，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其一，张光年在“向阳湖”“劳改”期间，受到了难友、群众们的特殊照应，这些难友有些曾是他的论敌、对手。但共同的苦难与人性的回归，使得张光年对先前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强烈的怀疑甚至荒谬感。对于一个有着实权的知识分子来说，“劳改”无疑是身心上的双重折磨。张光年在北京受迫害长达四年，早已看透人世间的种种荒谬。在干校时，他反而寻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他认为，这是“不幸中之幸事”。张光年不但蒙受别人的照顾，也

学会了捐弃政见、权力之别，主动关心、照顾别人，譬如在1970年的日记中，张光年多次记录“杨执一同志和（村里少年）安全宝帮我挂上了帐子，很感激他们”，“问我们生产劳动与生活情况，对我们很关心”；在1971年的日记中，他也记录在搬家的过程中“尹一之留下来（帮我拉东西）”，“张天翼说他心跳加剧，我让他多休息，我多值班”，“我同臧（克家）商量，提议我值整夜，他值全日”。向阳湖畔相互的提携、扶持，成为了张光年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除了在上生活上受到关照之外，向阳湖五年半尽管劳作辛苦、精神禁锢，但物质并不奇缺，这更使得张光年珍惜生活之美好，为“向阳湖归来”的张光年打开了一扇呼吸人生真善美阳光、远离污浊权力斗争的窗口。譬如在向阳湖“劳改”的他可以买到“古巴糖”、“电池”、“高级糖果”、“苹果”与“酱羊肉”，他将这些都一一记录在日记里。在人身失去自由、精神备受摧残的日子里，对于日常生活中这种来之不易的平凡温暖，张光年格外看重。正因这样独特的生活经历，“向阳湖归来”的张光年既有“劫后余生”的心有余悸，亦有“力挽狂澜”的壮阔情怀。这也是80年代的张光年缘何不惜受到批判，而敢于横眉冷对极左势力的重要原因。

其二，张光年在向阳湖五年半，实际上经历了从“消沉”到“崛起”的悲剧性崇高净化，人性、道德与正确的世界观在晚年时获得了重新彰显，这是张光年之幸、中国文坛之幸，更是向阳湖之大幸。刚刚到达向阳湖的张光年，是其人生中最消沉的低谷时期。1970年身受痔疮等病痛折磨，他情绪极差，面对生活之消极心态在日记中可见一斑：“今日起床较迟，到池塘边洗漱，连日没有这样痛快地洗脸刷牙”，“今日发现颜面、眼皮、腿和左手浮肿、不去管它了”，“整天在泥路上跑来跑去，什么也没有干成”，“睡得不好，夜一时半竟在恶梦中惊醒”，“指出我在参加运动和劳动方面还不够主动积极、生活上也不大刻苦、也不大主动跟革命群众交谈”等，屡见不鲜；但1971年的张光年在情绪上就已有较大的转变：“下午得到安迪自萝北来信，很高兴、读得老泪纵横”，“劳动能力较过去显然提高，心里感到高兴”，“干活时看到天鹅、白鹤、鹭鸶、沙鸥、野鸭、八哥成群飞舞”，“回家抬不动脚，但心里感到痛快”，“睡得较晚较少，却睡得酣畅”。

到了1974年、1975年，张光年曾请假回北京探亲，这使得他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希望，遂

对于生活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反映就是他开始广泛接触、阅读以文史类为主的各类报刊，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饭后散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两本小册子：《自然辩证法杂志（二）》、《天问天对注》”，“凭介绍信购得《资本论》、《法国革命史》等书五种”，“看了《傅立叶全集》上卷若干篇”，“翻阅《王荆公年谱考略》”，“浏览借来已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今天继续学英文《资本论》第一卷”，“看了一本通俗小册子《植物的生长》”，“小李带来资料室代购的《红楼梦新证》”，凡此种种，只要阅读必记录在案，这深刻地反映了张光年在“向阳湖后期”的心境，不再是初来乍到的消极沉沦，而是积极地坚韧地努力崛起。

纵观张光年一生，除却文革十年，鲜有大起大落之时。先前虽历经多次生死磨难，但仍属于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自幼家境殷实，军阀混战时仍可接受良好的教育，20多岁即凭借《黄河大合唱》享誉全国，1949年之后他又身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之高位。这些皆导致他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为获得权力不择手段。向阳湖五年半的大起大落给年近花甲的张光年重新补上了认识苦难、练达人情的一堂人生课。向阳湖的劳改营是他真正参透人生、顿悟世道的“训练营”。短短五年半，张光年完成了从“消沉”向“崛起”的人生蜕变。

四

当然，张光年晚年思想转变还与他在1979年患肠癌住院，经历过生离死别有着很大的关系，作家与病痛的关系也是目前国内文学史研究界关注的一个领域，但此与“向阳湖五年半”没有太大联系，遂按下不表。

通过前文的分析与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张光年在文学上早慧，但在人生上却晚熟。但是好在有了“向阳湖五年半”的“补课”，使得张光年迅速完成了人生蜕变，成就了其晚年人格的辉煌。对于张光年晚年思想转变的研究，笔者有如下两点浅见，求教于诸方家：

首先，张光年的遭遇，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家的遭遇，也可以看作是张光年一人之际遇，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从不同点出发，可以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有着更全面的认识。

论及文革后晚年思想之转变，有些研究者很容

易将张光年与周扬进行对比。实际上，周扬与张光年仍有一定区别。周扬作为1949年之后中共文艺政策的策划、执行者，其遭遇本身有着时代悲剧的意味。周扬文革后的反省及思想观的变化，其实反映的是中共文艺政策的反省与变化，周扬只是被投射的对象。但夏衍、张光年、黄秋耘、林默涵等一批“实权派”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却与自身的际遇息息相关。

在与李辉谈话时，张光年也认同这一点：我认为他（周扬）是一个有才华的领导人，有领导、组织才能。但是他也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作风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当时是遵循党的领导并在第一线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往往是事过之后，才觉得错了”，剖析周扬，其实同时也在剖析我们自己”^⑩。这也说明了，张光年与周扬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周扬更多地是为时代承担责任。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倘若张光年请求“下放”未获批准，在北京饱受蹂躏、折磨的他，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吗？若是没有“远离权力，彼此提携”的“向阳湖”生活经历，他会在80年代那样坚决地与极左势力据理力争吗？很难说。“向阳湖五年半”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权力瓦解”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每一个人都是失去了权力、政治身份甚至写作资格的“社会人”，只剩下“自然人”的身份。在天灾、病痛面前，人与人自然、平等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结合并非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人性中求生的本能。张光年经历了“向阳湖五年半”的生活，无疑比常人更加懂得人生的重要与美好。

其次，向阳湖文化研究，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一批知识分子晚年思想转变的动因，完全可以作为不同个案来分别研究。

张光年晚年的思想转变，既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更是“向阳湖知识分子”的一个特例。现在学术界习惯将“向阳湖知识分子”看作一个整体，实际上，每一个人在经历了“向阳湖生活”之后，其晚年思想都有非常剧烈、彻底的转变。少年得志、位高权重的张光年只是其中之一，当然还包括臧克家、崔道怡、冰心、沈从文、张天翼、郭小川与陈白尘等作家、学者。他们在去向阳湖之前，本身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地位，向阳湖的劳改生活，使得他们晚年的思想都产生了转变，那么其中每一个人既是

共性之一”，更是独一无二的个案。

因此，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更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可以看到关于其他学者、作家甚至革命家（如赵辛初）等人在经历向阳湖生活之后，晚年思想获得转变的研究著述，这必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课题。

注释：

①②③ 此说见于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2页。

④⑤ 张光年：《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百年潮》1998年第1期。

⑥ 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页。

⑦⑧ 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5页。

⑨ 谢永旺：《记晚年张光年》，《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

⑩ 王蒙：《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⑪ 张光年：《关于〈王蒙论〉的通信——王蒙论》序》，《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⑫ 王蒙：《光年千古》，《作家文摘》2002年第23期。

⑬ 张景超：《文化批判的背反与人格——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⑭ 张光年：《驳李何林同志》，《文艺报》1960年2月3日。

⑮ 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

⑯ 张光年：《风雨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页。

⑰ 张光年：《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评格·丘赫莱依的影片及其言论》，《文艺报》1963年第11期。

⑱ 萧乾：《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⑲ Robert Weimann, *Structure and Society in Literary Histor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9.

⑳ 李辉、张光年：《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韩晗，男，1985年生，河北衡水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